

从称谓系统角度看泛指性称谓语“同志”的历时演变及其动因*

焦毓梅**

目录

1. 引言
2. “同志”与汉语称谓系统的同步演变
3. “同志”的历时演变与使用中的“等差”问题分析
4. 结语

中文摘要

汉语称谓系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等差”，强调“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同志”这个泛指性称谓语的出现似乎彻底打破了汉语称谓系统的上述规则。前人研究中通常认为“同志”兴起和衰落基本上都是由于外部原因。

我们通过对“同志”的历时演变情况的详细考察，发现其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可用于“互称”、“无等差”的泛指性社会称谓，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泛使用，是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呈现“一体化”特征与汉语词汇系统、称谓语使用及泛化的一般规律共同作用而成的。称谓语“同志”的兴起、泛化、衰落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它的每次变化都与整个汉语称谓系统的调整同步，或者说，“同志”的变化是汉语称谓系统整体变化的一部分。

关键词: 同志, 泛指性称谓语, 历时演变, 汉语称谓系统, 社会文化心理

* 본 연구는 2023년도 덕성여자대학교 교내연구비 지원으로 이루어졌음

** 德成女子大学中文系教授

1. 引言

称谓语是人们用来表示彼此间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等所使用的名称，其中表示人们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称谓语叫作社会称谓语¹⁾。我们这里所说的泛指性称谓，是指社会称谓语中反映临时性社交关系的称谓语，如先生、女士、师傅、小朋友等。

称谓系统是词汇系统中最能体现社会文化心理的部分。清代《称谓录》作者梁章钜讲到“古人称谓，各有等差，不相假借。其名号盖定于周公制礼之时”²⁾，“定于周公制礼之时”虽不足信，但毋庸置疑，汉语称谓系统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密切相关，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等差”，强调“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在语用上，通常通过“尊人卑己”、“以亲代疏”的策略来实现“礼貌”，表达“友善”，但这种语用策略又必须是建立在“尊卑长幼有序”、“内外亲疏有别”的基础上，是不能违背“等差”原则的。

如旧时老人可对年轻友人称呼“小友”³⁾，现代老人对小孩称呼“小朋友”都是“尊长”通过“尊人卑己”，尽量消除“垂直距离的等差”以平等的关系进行交流，但“卑幼者”却不可以“老友”、“老朋友”称呼“尊长”，交际中“垂直距离的等差”依旧清晰存在。

如亲属称谓语（叔叔、阿姨、兄弟姐妹等）通常可转化为社会称谓语，用于称呼非亲属甚至陌生人，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则常见用“朋友”称呼陌生人甚至敌对方⁴⁾，这都是通过“以亲代疏”尽量消除“水平距离”的等差来表达亲近、友

1) 曹炜，〈现代汉语中的称谓语和称呼语〉，《江苏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2005年3月。

2) 梁章钜（清），《称谓录》，湖南：岳麓书社，1991年版。

3) 《汉语大词典》收“小友”词条，注为“年长者对所敬佩的年轻者的称呼”，又引《新唐书·李泌传》、清黄景仁《赠程生人中》诗、鲁迅《朝花夕拾》为书证，又检索CCL语料库大约有20个用例，可证这一用法从隋唐时期及五四以后一直存在。

4) 这一类例子在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多见，如：忽听恶奴说道：朋友，这个事你别管。我劝你有事治事，无事趁早儿请，别讨没趣儿。那军官听了冷笑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得的道理。（清《三侠五义》第44回）

好的态度。但真正的亲属称谓与转化后的社会称谓语，二者之间通常会有细微的差异，如“排行+哥/姐”通常用于称呼亲属，“姓氏+哥/姐”则通常用于称呼非亲属，而且如果是亲属与非亲属同时在场的情况，称呼一定有所区别。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用“朋友”作为面称称呼陌生人，就必须使用“兄”、“弟”等其他称谓语来称呼“真正的朋友”，交际中“亲疏”依旧“有别”，“水平距离的等差”也依旧存在。

“同志”这个泛指性称谓语的出现似乎彻底打破了汉语称谓系统的上述规则。通用的辞书基本都收录了“同志”的这一义项，如《现代汉语词典》收“同志”一词，其第二义项为“人们惯用的彼此之间的称呼”。⁵⁾胡范铸/胡玉华(2000)、俊虎(2001)、唐颖/曲晶(2008)、刘炳香(2017)等对“同志”一词的历时演变情况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描写，其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同志”在20世纪下半叶一直是中国大陆社会人群使用频率最高的泛尊称，特别是1950—1970年代无论职业身份、无论职务高低、无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无论是否属于同一政党都可互称“同志”，且可用于面称，也可用于背称。⁶⁾

前人研究中通常认为“同志”兴起和衰落基本上都是由于外部原因，如孙玉超/师文淑(2012)认为1949年之后“同志”迅速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称谓语，是“由当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影响造成的。在当时的苏联，“同志”就是人们之间最常见的称呼语，是一种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产物”，“同志”称谓在1970年代的衰落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削弱了相互平等团结一致的公民基础”。⁷⁾

综上，“同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可用于“互称”、“无等差”的泛指性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6) 参见下列文章相关论述：胡范铸、胡玉华，〈“同志”称呼语的语义功能与语用条件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期，2000年；俊虎，〈“同志”一词的演化及其文化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1年；唐颖、曲晶，〈“同志”称谓的源流及其演变原因〉，《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2008年；刘炳香，〈“同志”称谓的历史沿革与使用范围〉，《先锋》第7期，2017年。

7) 孙玉超、师文淑，〈“同志”称谓的历时演变及使用现状研究〉，《现代语文旬刊》第6期，2012年。

社会称谓，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泛使用，似乎与汉语称谓系统的一般性规律相悖，而且这种现象的出现也确如前人研究中所述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但“同志”在汉语称谓系统中是否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称谓系统中有无其同类现象，其在汉语称谓系统中产生、发展、衰落是否也存在内部原因等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尝试从汉语称谓系统的角度详细考察其历时演变情况，在与具有相似语义特点、语用功能或是演变路径的称谓语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发展演变的内部原因，同时更清晰地认识汉语的称谓系统及其发展。

2. “同志”与汉语称谓系统的同步演变

我们通过BCC语料库⁸⁾检索“同志”的历时情况，与前人相关研究⁹⁾对“同志”历时演变的描写基本一致。“同志”作为称谓语出现于20世纪之初，自1920年代始直至2010年代都保持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

将语料库考察到的情况与前人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可以粗略了解到“同志”首见于春秋战国《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其中“同志”指“志趣相投”，还是两个单音词的组合；直至20世纪才出现作为称谓语的用法，指具有共同理想追求的人（多用于指共同参与某项活动或同是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人），如1910—1920年《申报》所载文章多次出现“各地同志”、“我国同志”、“商

8) BCC汉语语料库，总字数约95亿字，包括：报刊（20亿）、文学（30亿）、综合（19亿）、古汉语（20亿）和对话（6亿，来自微博和影视字幕）等多领域语料，是可以全面反映当今社会语言生活的大规模语料库。

9) 前人研究中多提到“同志”一词由“社团政党内部成员”扩大到“社会普通人群”的变化，实际上其最初还经历了由指“普通群体”到“专指社团政党内部”的变化。“同志”作为称谓语语义最初比较接近原始意义，如“自立宪年限，明布于下，咨议局最关紧要，我鸠集同志，任调查，设事务所(1909年《申报》)”，例子中“同志”就是指“志同道合，共同做事的人”，只是一般还不用手指称具体个体，只用于指群体。

界同志”、“女界同志”等，到1920年代中叶随着各类新型社团、政党建立，“同志”则更多用于对社团、政党内部成员的称呼，并开始用于面称，其使用频率也大幅提高¹⁰⁾；在1949年前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同志”迅速展开来，成为全民性的泛尊称，几乎人人可互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政治原因，“同志”这一称谓的使用更为审慎，能否称“同志”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政治身份，但这一时期“同志”仍是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泛尊称；到1980年前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社会秩序的恢复，“同志”也迅速恢复为人人可用的全民性泛尊称；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众多称谓不断加入到汉语称谓系统中来，“同志”的使用范围逐步缩小、使用频率逐渐降低，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及涉及公务人员群体时，“同志”仍是最适合、最方便的称谓。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语料的进一步详细考察，我们认为“同志”历时演变情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其演变恰恰经历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三次大变革。从汉语称谓系统角度看，“同志”的演变与称谓系统的整体变化密切相关，社会外部原因与词汇系统内部原因共同推进了它的变化。

1) 自上古直至晚清语义基本保持稳定

“同志”自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语义指“志趣相同”，同时也用于指称“志趣相同的人”，这两个义项并行不悖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同志”的名词义项在词汇系统中属于普通的指人名词，可指单数，也可指复数，而情感上始终倾向于亲近、友善，这就为其后来成为指称某一群体的礼貌性称呼打下基础。

“同志”中“同”的语义始终保持稳定，用于指身份、地位“平等”的人，且并无明显阶层、职业、性别的限定，这就为其后来成为全民性、泛指性称谓打下了基础。

但“同志”中“志”语义宽泛，可以指“兴趣爱好”、“节操品德”、“志向追求”也

10) 同注6)、注7。

可以具体指致力于某项事业或某件事，“同志”则根据具体语境指称不同对象，如：

- (1) 心难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择地，浊操伤行，世何效放？（《论衡·自纪》）（同志指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
- (2) 华里朱膺，清信士也，乃沐浴清斋，要请同志，……乘船至沪渎口。（《全梁文》卷十四）（同志指与自己同样信奉佛法的人）
- (3) 刘向岂顾人哉？直坐不得口诀耳。今将载其约而效之者，以贻将来之同志焉。（《抱朴子·内篇》）（同志指同样致力于炼制丹药的人）
- (4) 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敬父同志，如事父。（唐《通典》第六十八卷）（同志指朋友）
- (5) 薛肇，不知何许人也，与进士崔宇，于庐山读书。同志四人，二人业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寻已擢第。唯肇独以修道为务。（《太平广记》卷十七）（同志指一起读书的人）

上边一组例子中，“志”在例（1）中指向个人志趣、品德方面，例（2）中指向比较具体的理想信仰“佛教”，例（3）中指向致力于从事的事业（炼丹），例（4）例（5）中“志”的意义已经虚化，“父同志”，只是与父亲有交往的友人，例（5）中“同志”四人，其实志向各不相同，只是暂时一起读书而已。

因“同志”可用于指任何一个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个体或群体，缺乏稳定的核心特征，就很难像“同乡”、“同门”、“同年”¹¹⁾一样与某一特定身份、特定群体生成清晰的对应关系，因而也更容易演变成称谓语。但也正因为“同志”始终游离于称谓系统之外，在时代变革、除旧布新时，“同志”也更容易成为新称谓系统中的核心成员。

这一时期，“同志”的语义、语用特征可概括为【+共同】【+亲近/友善】【+人】/【-称谓语】。

11) 同乡，指同一乡里，同一籍贯的互称同乡。同门，指同师受业，也指同师受业的人。同年，指同年中举的人。《汉语大词典》收类似的“同X”结构的称谓语近20个。

2) 自晚清至民国时期进入称谓系统并迅速发展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动荡新旧两种势力对立。“同志”除继承前代用法外，在政治领域逐渐成为了一个“区别新旧”的称呼，一般只有“新派”、“革命派”使用“同志”，而清政府官僚保守派及一般民众日常都不会使用这个词。

检索CCL语料库¹²⁾发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¹³⁾中仅有《孽海花》中有10个例子均用于指“维新派”或反清的“革命党”，如：

- (6) 不必胜佛通信关照，自有闻韵高、杨淑乔、林敦古一班同志预告立人，早已扫径而待……刘光地、梁超如等，主客凑了十人，都是当代维新人物，在虎坊桥韵高的新寓斋替胜佛洗尘。（《孽海花》第三十五回）
- (7) 我现在急欲告诉先生的，是我这次从北京来南，受着几个热心同志的委托，特来敦促先生早日出山。……常肃道：“我们要谈的话多着呢！我们到里面内书室里去谈罢！而且那里已代先生粗备了卧具。”（《孽海花》第三十四回）
- (8) 那时戴胜佛已一脚跨进了房门，微笑的说道：“昨夜太惊动了，不该！不该！但是我先要声明一句，我辈都是同志，虽然主张各异，救国之心总是殊途而同归。”（《孽海花》第三十五回）
- (9) 徐勉道：“哪个走漏消息，至今还没明白。不过据原报告委员李家焯说，是党员自首的。”胜佛拍案道：“这种卖友党员，可杀！可杀！……陈皓东的供辞非常慷慨动人，临刑时神气也从容得很。这种人真是可敬！又谁知害他的就是自己党友朱淇，首告党中秘密，这种人真是可恨！”（《孽海花》第三十四回）

12) 詹卫东、郭锐、谌贻荣，2003，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规模：7亿字；时间：公元前11世纪-当代），网址：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13)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是指刘鹗《老残游记》、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曾朴《孽海花》，均为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白话作品，前三部主要描写晚清官场及洋场情景，其中人物均未使用“同志”一词，只有《孽海花》中有部分章节正面描写了当时“变法维新”及“反清革命”的人物（其中“戴胜佛”等人据说是影射谭词同、梁启超、孙文等），相关用例均与这些人物有关。

从这一组例子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如“戴胜佛”一类维新派人物很自然地使用“同志”一词指称“共同从事维新、革命的人”，且并不限于同党同派（如例8），但并不用于面称或特指某一。值得注意的是，“同志”语义仍与早期意义相近，感情上也依旧带有亲密、友善的色彩，同志的“志”则基本上确定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党员”、“党友”等词指同一政党组织成员（如例9），与之相比“同志”更接近于称谓语。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清朝统治结束，中华民国建立，在公众层面旧势力、旧称谓逐渐衰落、退出¹⁴。“同志”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使用上也出现了明显变化。

首先，随着近代报业的发展出现大量的新闻报道、公告、启事等较为正式的文章，其中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用例，但都不用于指称特定的某个人。检索BCC语料库中收录的《申报》所载文章，凡是面向公众的公告几乎都使用“同志”一词，具体报告中涉及具体个人则尊称为“XX先生/君/女士/太太等”，如：

- (10) 又组织丝竹京剧等部，每月开演著名影片两次，凡属社员，均可享不费分文之权利，借以连络同志，发展电影事业。（《申报》1925）
- (11) 不入歧途撰述者多女界同志，图画之精印刷之美当为有目共赏，第一册现已出版。（《申报》1915）
- (12) 则凡吾药业同志，应舍弃舶来品，专销中国人自制之药。（《申报》1925）
- (13) 最近又受江苏省教育实业联合会委托代办职业教育委员会，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或利宣传、或资实宴，幸荷各界同志热心赞助，先后加入本社者达六千六百余人。（《申报》1926）
- (14) 本会……开幕赈游艺大会七天。……海内同志，愿以义务游艺加入

14) 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伴随着称谓语的新旧更迭，不过基本上集中于政府以及公众层面，而民间私人领域称谓的变更则相对滞后许多，这一时期也是如此。明清两代官职名一般不能用于面称，需另加尊称如“老爷”、“大人”等。民国之后，随着“总统”、“总理”、“X长”之类词语的广泛使用，人们更习惯以职务直接作为尊称，“老爷”之类称谓语在公众领域迅速消失，但在私人领域家庭内部（即使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地区）老爷、少爷、太太、奶奶等称谓语都一直被沿用到1940年代。

募赈者，请驾临新世界办事处接洽。并欢迎各界客串登场。（《申报》1925）

- (15) 灾黎与沪上失业贫民，均流离失所，待哺嗷嗷，几成饿殍。本会同人惨不忍睹，各愿先解私囊。已于旧岁十一月初十日，在闸北乌镇路设厂放粥。兹承诸大善士慨助米洋，除交本会核收外，合亟登报以扬仁风。且鹏程君洋一百元广沅茂君洋一百元江淮寄庐名氏米廿五石杜寅记君五十元徐锦记君五十元。（《申报》1925）

这一组例子中“同志”主要用于指某一群体，例（10）还可以单纯理解为“有共同理想的人”，例（11）—（14）则基本上只是指共同参与某一活动或从属某一领域的人：“女界同志”是指“女性群体”，“药界同志”是指从事医药生产销售的群体，“各界同志”、“海内同志”则是指参与活动的所有人。而在具体指称某一个人时则不使用“同志”，如例（15）的捐助名单均使用“姓名+君”。

综合来看，在这一领域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同志”成为一个通行于社会各界的新兴的“集体名词”。但同期中华民国政府及军政界相关文件、社论文章及文学作品中，“同志”已经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称谓语，可用于书面语，也可用于口语，可用于背称，也可用于面称，如：

- (16) 主席潘公展致开会词……中央代表各机关代表诸位来宾诸位同志，今日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开幕典礼。（《申报》1931）
- (17) 三次不出席党员大会者，由该区分部再去一严重警告。其警告词曰「某某同志」查同志无故不出席党员大会，业已三次。（《申报》1931）
- (18) 平汉路上我们有二十个同志，中有一人系党团之领袖，军事上的策略与行动，我们正要请军事同志的指教。（《申报》1931）
- (19) 我今天之所以要说这句话，就是在这两年来，公安局方面、办理特务工作的同志，一再因他的职务，为仇敌所杀害、牺牲了生命的已经不少，最显著的有马绍武同志和最近被害的黄永华同志。（《申报》1933）
- (20) 胡国光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抢前一步说：“我要找慕游商量一件事，正没处去找呢。朱同志，你知道他的踪迹么？”……“主席，众位同

志。我就是胡国光，原名胡国辅。……“这位是胡国光同志，专诚来拜访罗兰兄的。”（矛盾《蚀》）

(21) “赤珠！我就不信没有男同志和你开玩笑。”王女士斜睨着赵女士，针对史大炮的话说。（矛盾《蚀》）

(22) 明天孙小姐去了不到一个钟点，就带一个灰布装的女同志回来。……那女同志正细看孙小姐的毕业文——上面有孙小姐戴方帽子的漂亮照相。（钱钟书《围城》）

例(16)中“诸位同志”与“代表”、“来宾”并列显然是专指国民党党内成员而言，例(17)是党内公文函件的范例，开头用“XX同志”、“同志”，可见当时在正式场合对党内成员称“同志”是标准的用法。例(18)、(19)叙述性文字中，用“同志”、“从事……工作的同志”指称党内或政府内相关人员带有礼貌的性质，提到具体人时则使用“姓名+同志”的称谓，语气庄重。例(20)的对话中出现几位人物都是政府公务人员，互相之间均可用“同志”称呼，用“各位同志”称呼大家，正式介绍用“姓名+同志”，面称某人用“姓+同志”，但均用于不太熟悉的人。例(21)、(22)中王女士、孙小姐等人是政府公务群体之外的“外人”，用“男同志”、“女同志”主要是强调其公务人员的身份，但面称时并不会用“同志”。

3) 1940至1970年代在中国大陆地区迅速发展为全民性的泛尊称

我们考察194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各类语料，情况基本与国民政府方面一致，只是“同志”的界定范围更广，使用范围也更广。

党内正式报告、函件以及报道，基本上只对“党内”称“同志”，如：

(23) 另一方面就是党内同志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不给党外人士创造工作的条件，因此，想负责任也负不起来。（《人民日报》1957）

(24) “中国福利会二十年”的纪念册里，刊有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和宋庆龄先生、董必武同志的专文，有廖承志、康克清、萧三、伍云甫等人的文章，还有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路易·艾黎等人的纪念文章。（《人民日报》1958）

例 (23) 将“党内同志”与“党外人士”并举，例 (24) 称国民党人士宋庆龄为“先生”，称共产党员董必武为“同志”。这种称呼上的区别在共产党党内成为通例，一直沿用至今。在一般情况下，凡是参与政府、军队相关工作的均可称“同志”，因而除了“姓名+同志”的用法外，出现了大量“职业/职务+同志”的例子，如：

- (25) 记者走遍了机关的各个部门，看到每个同志都在紧张的生产。中央局驻地东边的小学校，一群一群的男女同志、通讯员、小鬼们，正爬在三十多间墙壁的前面，用石灰把每块墙壁洗刷得雪白。这是行政处、民运部、组织部、通讯班的同志们在替大会筹委会包工生产。（《人民日报》1947）
- (26) 炊事员同志不断到伤病员房内去征求对饭菜的意见。（《人民日报》1947）
- (27) 乐队中的同志，有好几个旧艺人都能读简单的生歌子，不用别人再教了。……旧艺人同志这样的进步，无形中给知识分子同志一个启示。（《人民日报》1947）

例 (25) 使用“每个同志”、“男女同志”显然是用“同志”指称所有相关人员；例 (26) 中“炊事员”也是一个新兴的称谓语，与“同志”搭配显得格外尊重；例 (27) 是在使用礼貌性称呼“同志”的基础上，补充了“旧艺人”、“知识分子”等区别性特征，使得指称更明晰。

在相关文学作品中，可以见到大量“同志”用于面称的例子，如：

- (28) 那两位干部连忙问：“什么？旅长！什么？我们党中央才离开延安？不会吧！”那位旅长喉咙里涌起激愤和沉痛。他说：“同志们……不要再问！……走！”（杜鹏程《保卫延安》）
- (29) 他边走边问：“老乡，敌人还远哩吧？”“远哩？人家说，敌人到了咱们延安城啦！……”“咳！你才瞎说。同志，敌人离延安还有三四十里路程。”……又问：“老乡，不是说你们早就撤退了么？怎么，你们还挤在这里？”老乡们乱噪噪地回答：……乡长同志天天劝说……（杜鹏程《保卫延安》）
- (30) 赵玉林这话还没说完，老孙头就接着说道：“对呀，萧队长，王同

志，刘同志，都是百里挑一的人品，还要你们娘们？（周立波《暴风骤雨》）

(31) “队长同志，你不明白，车窝在泥里，不打有劲的，拉不出来呀。

（周立波《暴风骤雨》）

(32) 戴黑毡帽的老头又说：“同志你听听，大伙都乐意欢迎，也快到半夜了，这会该散了吧？”（周立波《暴风骤雨》）

当时军队与政府内部一般对上级用职务称呼，对下级多直呼姓名，遇到陌生的战士或是政府公务人员则用“同志”、“同志们”、“小同志”等称呼（如例28）。而普通群众对有明确职务的军队或政府人员一般用“姓+职务”或是“职务+同志”，对普通工作人员则用“姓+同志”称（如例30、31），对陌生的工作人员则直呼“同志”（如例32）。军队或政府工作人员对普通群众一般不会称呼“同志”。

这种情况在1950--1960年代的语料中基本延续了下来，如：

(33) 于壮（民警）：李同志，你进去吧，找炊事员王仁德就行啦！

李天祥（退伍军人）：对！谢谢你，同志！（老舍《全家福》）

(34) 丁四：赵大爷，赵大爷，那是刚才，现在我又好啦！同志，就凭您亲自把二嘎子背回来，您教我干吗，我干吗！（老舍《龙须沟》）

例（33）中两个人初次见面，又都有公务人员的相关身份，所以互称“同志”；例（34）说话人是普通群众，称自己邻居为“X大爷”，只称公务人员为“同志”。可见，在普通群众心中“同志”与政府公务人员群体关联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城市内各行业普通工作人员之间可互称“同志”，一般群众也会用“同志”称呼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如：

(35) 我们俩就往各处邮局一打电话，果然找到了失主儿，是个女同志，急得都说不上话来啦！……我又怕邮局的女同志脱不开身，我就飞跑给送去了。（老舍《全家福》）

(36) 男 丙（一老农民，拿着不少东西，到帽柜前）：同志，有娃娃戴的小老虎帽儿没有？店员乙：哟！那可没有，老大爷！得上儿童商店。（老舍《女店员》）

(37) 陶月明：你们看，（指胸前证章）往日我一出去，就摘下它来，唯

恐叫人家看见，有失体面！现在，我要作个好售货员，把它挂在正中间，叫所有的人都看见，都叫我一声同志！（老舍《女店员》）

例（35）普通群众用“女同志”指称邮局的工作人员，例（36）顾客称呼店员为“同志”，例（37）则能看到当时对售货员称“同志”是当时的新风尚。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结构调整的事实，建国后城市内公私合营，凡工厂、商店、邮局、公共交通、演艺之类行业几乎都变为公有制，其职工也就有了“公家人”的身份，人人都是“公家人”，自然人人都可称“同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行业本来属于社会底层，不受尊重，没有一个礼貌性的称谓语，用“同志”填补这一空白，满足了这些普通人心理上被尊重的需求，也增强了对“公家”的归属感。

至此，随着中国大陆地区社会结构的调整，“同志”基本上完成了其演化。日常生活中，凡是公有化的单位企业，内部普通人均可互称“同志”，与之相关的人员均可被称为“同志”。再进一步，由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是“同志”，与陌生人交际时，除了看起来太不像“同志”的，都可以使用“同志”作为礼貌性称谓语。

在1960年代中叶直至197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牵涉其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受到冲击，丧失了被称为“同志”的资格，一直到70年代末文革结束，这些人陆续恢复身份，又重新获得了被称为“同志”的资格，很多回忆文章与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段历史，如：

（38）她对朴同志使个偷乐的眼风，叫他扯风箱……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随着社会的变化，“同志”一词在文革期间使用频率有所下降，到1980前后又达到一个高峰。但这一时期，社会的整体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社会称谓系统也基本保持不变，“同志”的使用范围也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受环境影响使用时要考虑一下对方的政治身份是否在“同志”之列。

4) 自1980年代之后逐渐缩小使用范围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迅速转型、分化，人们心理认知上倾向于否定前一时期的社会身份定位，现代化、个性化成为主流追求。称谓系统也因而变得异常丰富，很多已经消失的社会称谓（如老板、先生、小姐等）再度回潮，新的社会称谓也层出不穷（如美女、帅哥），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同志”泛指性称谓语的位置。

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称谓语系统的调整，“同志”一词甚至在党内的使用也受到冲击。如刘炳香（2017）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称职务头衔的逐渐多了起来，蔓延到党内，以至于司空见惯，在党内活动中很难听到互称同志，即使是在党委会上，甚至在党小组会上，党员之间也都互称官衔，或将市场经济中对企业老板或高层管理人员的称呼用到党内生活中，或为了显示亲密，在党内称兄道弟、呼姐唤妹。“同志”称谓被“头儿”“老板”“老大”“大哥”“老弟”“姐”“妹”等取代。¹⁵⁾面对这种情况，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内一律互称同志”。

于是，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称谓系统迅速发展，“同志”的影响迅速消退；一方面，党内以强制性行政命令方式强化“同志”的使用，客观上阻止了其退出称谓系统。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直至2020年代，在政府机关部门内部，无论公文还是日常工作一律称“同志”；指称政府普通公务人员时，一般也在人名后加上“同志”。于鹏（2023）以《县委大院》为主要语料考察公务人员相关称谓语使用情况发现，在公务人员面称系统中，“职务”是最核心的信息，因此职务类面称使用最多。“领导”是行政公务体系中唯一的模糊性尊称，既是行政体系内下级公务人员对上级的敬称，也是非行政体系人员对政府各级各类公务人员的泛尊称。¹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群众对不熟悉的公务人员面称由“同志”转为

15) 刘炳香，〈“同志”称谓的历史沿革与使用范围〉，《先锋》第7期，2017年。

16) 于鹏，〈中国政府公务人员称谓语系统面称用语考察——以电视剧《县委大院》为中心〉，《中国言语研究》第105期，2023年。《县委大院》2022年12月上映，以某县县委工作为主线，其中涉及的称谓语系统而丰富，不仅涉及行政体系内严格的职务等级，而且涉及使用称

“领导”，如：

- (39) 农民工：领导，您来了。（《县委大院》第8集）
 小商贩：领导，你慢走啊。（《县委大院》第11集）
 饭馆小老板：二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县委大院》第11集）

在这一语料中，“同志”基本上应用于比较正式的党内组织活动或者公务场合，具有强制性使用的特点，如正式讲话时用“同志们”、“全体同志”开始，用“姓名+同志”称呼具体某个人时通常意在强调同属党组织，大家地位平等。用于日常社交礼貌性称呼普通人仅8例，其中2例与职业相关为“警察/警官同志”，其他6例交际双方都至少有一方是公务人员。

综上所述，自1980年以来“同志”使用范围逐渐缩小，至今基本只在党内及公务系统内部使用，基本上退出泛指性称谓领域（让位于专属于某类行业的一般性称呼如老板、师傅、大夫等），也不再是普通群众对一般政府公务人员最常用的称呼。¹⁷⁾

5) “同志”历时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分析

(1) “同志”历时演变的四个阶段及其语义、语用范围

自晚清至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三次巨大变化，“同志”在语义、语用方面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指人名词）：上古至晚清

- 1.志趣相投。
- 2.名词，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理想追求的人

谓语的个人情况。

17) “同志”一词由香港等地始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称呼，近年来大陆在某些领域也开始使用这一义项，但其基本上仍然只是一般名词，还未进入称谓语系统，我们这里暂时不进行讨论。

3.名词，共同从事某一活动或事业的人。

4.名词，有某段共同经历的人。

5.名词，朋友。

第二阶段（称谓系统新兴重要成员）：1900年代—1940年代

1.名词，专指与自己共同从事维新、革命的人。

2.集体名词，专指与自己参与同一活动或同属某一群体的人。

3.正式称谓语，用于称呼与自己同一政党内的成员。

4.一般称谓语，用于政党或政府相关公务人员之间的称呼。

5.名词，指政党或政府相关公务人员。

第三阶段（社会称谓系统核心成员）：1940年代—1970年代末

1.正式称谓语，用于称呼与自己同一政党内的成员。

2.一般称谓语，用于称呼与自己同样从事革命工作的所有人，其指称范围涉及自最高层的领导人至军队、政府内部最底层的炊事员、饲养员，自核心的党员、政府内部人员至临时参与后勤工作的民工、妇女。

3.一般称谓语，普通群众用来称呼军队、政府相关公务人员。

4.一般称谓语，从事普通职业群众间相互称呼。

第四阶段（社会称谓系统一般成员）：1980年代—今（大陆地区为主）

1.正式称谓语，用于称呼与自己同一政党内的成员，一般适用于党内组织活动或者公务场合。

2.一般称谓语，普通群众用来称呼政府相关公务人员，一般适用于公务相关场合，且正在被“领导”等称谓取代。

3.一般称谓语，从事普通职业群众间相互称呼，使用者多年龄较大。

(2) “同志”历时演变与汉语称谓系统的调整

综合来看，称谓语“同志”的兴起、泛化、衰落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它的每次变化都与整个汉语称谓系统的调整同步，或者说，“同志”的变化是汉语称谓

系统整体变化的一部分。

清代沿袭前代制度，官僚机构内部等级分明，一般来讲官职名称不能直接用作称谓，所以下级对上级要根据官职采取不同的敬称（如对知府、知县尊称为太爷），泛尊称则一般用“大人”，平民对官员（或地方乡绅）则需尊称“XX老爷”。又因官僚体系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官员之间交往，除注重宗族姻亲之外，还特别注重“同门之谊”、“同年之谊”，因而常用“座师”、“学生”、“同门”、“同年”、“X兄”、“X弟”等称谓。

晚清末年至民国时期，“新派”的“革旧鼎新”在称呼上就体现为称谓系统整体性更新。首先，新兴的政治群体需要一个区别于旧体系的全新的称谓语。始终游离于称谓系统之外的“同志”，在语义上符合当时维新派、革命党“同心同志”的心理需求，又不受地域、年龄、性别、身份的限制，还在形式上与旧称谓系统中“同门”、“同年”、“同乡”等形成鲜明对立。“同志”凭借多方面优势就此进入“新派”的称谓系统，并随着国共等政党的建立成为其中最通行的称谓。

在民国政府时期，因政府公务人员与国民党党员高度重合，所以“同志”又迅速在政府机关中流行开来。同时，为明确政府机构不同层级、不同职责从西方、日本引入了一整套新的职务名称，并且这些职务名称可以直接作为尊称使用，从名称到使用习惯都和晚清区别开来。于是就形成了讲区别称“职务”，讲平等称“同志”；强调个人职责、地位称“职务”，强调集体团结一致称“同志”的用法。

在民国初期，随着西方的影响，城市中新式工商业兴起，跳舞场、电影院、西装、旗袍成为时尚，市民中比较“洋气”的也借用“同志”一词指称与自己共同参与某一活动或某一组织的人，但只用于称呼非定指的对象。同时，这类市民群体也有一套新的称谓，如董事、经理、先生、小姐等，满足“求新”、“求异”的需要。保守派或是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则依旧使用着传统的称谓，如“老爷”、“少爷”、“公子”、“大爷”、“大妈”、“姓/排行+爷/哥”等。

新的称谓体系基本调整完成，不同社会群体使用不同称谓的格局形成，“同志”成为党政系统内部的正式性称谓，可用于称呼群体，但日常个人交际中仍遵

循“等差”原则选择差异性称谓，因而“同志”没有产生泛指性称谓的用法¹⁸⁾。

1940年代—1970年代，共产党政府在自己管理区域逐步建立了一个“同一化”社会，社会基本上只有三种人“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普通群众”以及“对立面的敌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带有旧时封建色彩的老爷、少爷之类，带有城市资产阶级色彩的先生、小姐之类泛指性称谓都退出了系统，而当社会上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成为了“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那“同志”也自然成为了全社会通行的泛指性称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志”的泛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为推进“平等”的观念，利用“X员”格式创造了一系列的新词语以区别于旧称谓，如旧军队的“长官”改称“指挥员”，士兵改称“战斗员”，“伙夫”改称“炊事员”，“马夫”改称“饲养员”，诸如“担架员”、“运输员”等等数不胜数，几乎每个分工都有了专门的称谓。对称谓系统的这一调整，不但推进了群体内部平等，互相尊重的理念，更在心理层面满足了普通人被尊重的期望，如《淮海战役支前民工政治思想工作之预则立》一文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

有部队同志叫“夫子同志”，民工不乐意，即回答：“我自愿上前线替战争服务，不是强迫来当夫的！革命同志就是革命同志，俺不跟你夫呀、妻呀的！”为此陈毅司令员特意在47年6月华东野战军干部会议提议改变这一称呼，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一种轻贱的称呼，与我们劳动人民服务前线的自由劳动的新内容太不相称。”部队的干部、战士称呼支前民工为“担架员同志”或“运输员同志”，他们就感到很高兴。

“同志”可以附在职务之后组成一般礼貌性称呼，如“连长同志”，在称谓系统调整后就自然生成“司令员同志”、“担架员同志”、“运输员同志”等称谓形式，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同志”使用范围的扩大。

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一体化”社会的解体，称谓系统也随之调整，又恢复为不同社会群体使用不同称谓的格局。大量旧有称谓作为时髦的

18) 我们这里所说的泛指性称谓是指社会称谓语中反映临时性社交关系的称谓语，如先生、女士、师傅、小朋友等。

新词语从港台地区重新进入大陆。在求新、求异的心理追求下，新的称谓词语层出不穷，几乎每隔一段都有新的称谓语产生，也有旧的称谓语退出。整个称谓系统成员众多，整体呈现“去核心化”的特征，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使用频率最高、最核心的泛指性称谓语。“同志”作为旧称谓系统的核心词汇，也随之被其他社会称谓语所取代，逐渐退出相关领域。

3. “同志”的历时演变与使用中的“等差”问题分析

在粗略梳理“同志”历时演变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尝试首先从汉语称谓系统角度解释“同志”泛化及其演化成为具有【+平等性/-等差性】【+可互称】特点称谓语的原因，并尝试解释其在具体语用中对汉语称谓使用中【+等差性】原则的突破与遵循。

1) “同志”的“泛化”与汉语称谓系统中同类现象

“泛化”指的是用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特征的称谓语称呼不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征的人，这是社会称谓语发展演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称谓语“泛化”通常涉及两种方式：一种由“小”的群体称谓泛化为“大”的群体称谓，如“老师”本来是教职员中“教员”的专属称谓，后来泛化为“教职员”通用的称谓；另一种是整体交际关系的转移，如“老师”本是教育场景中“学生”对老师的尊称，但在电视节目中就经常转移为节目主持人对采访对象的尊称，这种泛化实际上隐含着移用“老师—学生”之间关系的意味。

称谓语的泛化过程语义上常常伴随着主要义素的消失，但不管经过多少次泛化，其最终语义总会受到初始语义或语境的限制，因而也无法泛化到社会通用的“全民性”的程度。

如“和尚”源于梵语音译，本指“亲教师”。在中国最初用于佛教僧团内部，

是弟子对老师的尊称¹⁹⁾，语义具有【+老师】【+男性】【+出家】【+佛教徒】【+尊敬】几个义素，最终保留了【+男性】【+出家】【+佛教徒】几个义素，成为对该群体的一个一般性称呼，以后就无法更进一步了。又如“先生”由于继承了前代由源头（先生指老师）发展而来的全部义项，又综合了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新用法，在民国期间成为使用范围最广的泛指性称谓语，几乎达到不限身份、不限性别、不限年龄的地步，且可用于称呼陌生人，但却仍旧保持了【+受过一定教育】的特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小崔、李四爷这样的体力劳动者，说相声的方六这样的下九流，以及没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们就都不能被称为“先生”。

“同志”能泛化为“全民性”泛指性称谓语，一是与其最初语义所指宽泛，并不严格限定于某个职业、某个身份、某个群体；二是特殊的社会形态最终促使其适用范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特殊社会形态的瓦解，其适用范围也迅速缩小。

“同志”在进入称谓语系统之前，作为普通名词只有【+共同】【+人】两个义素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或几个人在一起都可称对方为“同志”，从第三方视角看，也可以认为两个人或几个人的群体是“同志”。这就为后来其泛化为“全民性”泛指性称谓语打下了基础。

“同志”第一次进入称谓语系统，与前一阶段相比，受时代背景、使用群体影响增加了限制性语素：【+某一共同政治群体】【+称谓】。此后每次演变其实都是“政治群体”的变化：政治群体变为稳定的政党，其语义就成为【+共同政党】【+称谓】；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建立，政治群体的内涵就变为“国民党及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其语义也随之扩大到这个范围；在1940年代解放区政治群体的内涵是“所有参与革命工作的人”，在建国后政治群体的内涵仍旧是“所有参与革命工作的人”，但几乎所有成年公民都参与到这个群体中来了，其语

19) 如《大唐德业寺亡尼墓志》中“圣道寺比丘尼善意灰身支提塔，弟子法润、智慧、法滕、善静、法神等为和尚敬造”一句，“和尚”与“弟子”相对，就是“老师”的意思。同时“和尚”也被用来尊称年高德劭的高僧，如称慧远大师为“远和尚”，后来逐渐成为大众对出家修行男性佛教徒群体的称呼。

义范围也随之扩大到“全民”的范围²⁰⁾，但仍旧有部分群体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只能在特殊语境下被称为“同志”，如民主党派人士、学生、家庭妇女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整体政治色彩的消退，普通职业人群实际上退出了共同的“政治群体”，“同志”的语义也恢复至【+党及政府机关相关人员】【+称谓】。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性”社会称谓语。“同志”始终保有从属于【+某一共同政治群体】这一特征，所以严格来讲，并没有达到“全民性”的程度，其泛化过程与其他泛指性称谓语的泛化过程基本一致。

2) “同志”与汉语称谓系统中的“互称”现象

汉语称谓使用时，特别注重尊卑长幼之间的“等差”，然而遇到双方身份、年纪相当，以及心理上特别追求双方平等地位的时候，也会出现用同一个称谓语“互称”的情况，这种现象自古及今一直存在，只是容易被忽视。

这种称呼常发生在某一群体内部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之间或是交往初期不太熟识的阶段，²¹⁾如下边例子中的“同学”、“道友/道兄”、“同年/年兄”：

- (40) a学生A：同学，广播站在哪边？ 学生B：直走，左拐。……同学，错了，再往前直走……（自拟）
b陌生人：同学，你们校长室在几楼？ B：阿姨，三楼。（自拟）
- (41) a华清风一瞧不认识。赶紧说：“道友从哪里来的？”老道说：“华道友，你不认识我呀，你是我的房东。我在你庙里住了半年了。”华清风说：“是是，道友请前面坐。”……那道人说：“我姓常，我跟你有一段仙缘。”……华清风道：“常道友参修多少年了？”（《济公全传》第八十六回）
b闻太师看见，大呼曰：“列位道友，好自在也！”众道人回头，见是闻太师，俱起身相迎。内有秦天君曰：“闻得道兄征伐西岐，前日申公豹在此相邀助你，吾等在此练十阵图，方得完备。适道兄到

20) 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汉语词典》注释相关义项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彼此间的称呼。

21) 在进入“熟人”阶段的时候，一般会互称姓名、字号，或是按照“等差”关系重新选择不同的称谓词。

临，真是万千之幸！”闻太师问曰：“道兄练的那十阵？”（《封神演义》第四十三回）

(42) a蔡御史道：“不觉荏苒半载，回来见朝，不想被曹禾论劾，将学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馆者，一时皆黜授外职。学生便选在西台，新点两淮巡盐。宋年兄便在贵处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门下。”（《金瓶梅》第四十九回）

b蔡御史道：“他如今见是本处提刑千户，昨日已参见过年兄了。……如今见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宋御史道：“年兄还坐坐，学生还欲到察院中处分些公事。”（《金瓶梅》第四十九回）

例(39)中“同学”在现代汉语中指“一起学习的人”，常用于学生群体内部互称，一般只适用于不认识的陌生对象（如句a），认识的就会直接互称姓名或是XX同学；因其是学生间最常用的称呼，也就成为其他人对学生最常见的礼貌性称谓（如句b），且其中“同”带有平等的意义，所以基本上只有更年长的人会使用这一称谓，隐含有降低自己长者身份的意思，以满足“尊人卑己”的语用需求。

例(40)中“道友”在明清小说中常见，指“共同修道的朋友”，用于修道者内部互称，一般只适用于不认识的对方，一旦获得更多信息就会随之调整称呼，如a句完全陌生时称呼“道友”，知道姓氏后，马上改称“常道友”；b句中用“列位道友”称呼在场众人，但当秦天君与闻太师一对一交流时，双方很自然地遵循“尊人卑己”的原则，放弃带有平等意味的“友”，改用“道兄”称呼对方，结果因双方同时追求“等差”，又一次实现了“平等”的互称。例(41)中“同年”、“年兄”的语用情况基本与例(2)一致，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a句中蔡御史用“同年”指称相关的十四人，即使是背称也用了“宋年兄”称呼自己相识的宋御史；b句中蔡、宋二人年资、职位相同，二人同时自称“学生”，用“年兄”称呼对方，通过追求“等差”，实现了“平等”的互称。

这一类“互称”现象主要是交际双方掌握信息不足，只知道对方与自己同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如同学、道友），或是要特意强调某个群体的特征（如同年）²²⁾，无从确定尊卑长幼，因而倾向于采用具有【+平等】特征的“同”、“友”

等构建称谓语。后续，又常因双方各方面情况相当，双方都不肯僭越，于是同时采用了【+等差/-平等】的尊称，再次实现【+平等/-等差】的互称。

“同志”的发展演变过程实际上一方面体现了“去差异化”的追求，既最大限度的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垂直距离”，又打破各个群体之间的“水平距离”，——这是与打破封建传统社会等级，建立人人平等新社会的时代理想一致的；一方面也体现了汉语称谓语系统中的“尊称”向下兼容的一般性规律。

“同志”这一称呼最初在某一政治群体内部使用时，互称“同志”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平等参与的成员，且使用这一称谓也可凸显所属群体以及自己身份有别于封建官僚的特质，有通过称谓强化“身份”的特殊语用目的。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群对自己身份有明显的自豪感与荣誉感，用“同志”称呼对方既表达了对对方的尊重，又强调双方“志向相同”，凸显双方的一致性，拉近彼此距离，从而满足交际中“垂直距离”与“水平距离”的双重要求。

这一传统后来被国共两党继承下来，并逐渐形成了强制性使用的法规，规定正式文件、正式讲话中不论职务高低一律称“同志”，但主要用于背称。在面对面交流时，会尽量避免“互称”的情况，熟识的人即使是限于规定必须互称“同志”，也会用“姓名+同志”、“姓+同志”、“名+同志”、“小或老+姓+同志”进行细微的区别，以符合一般的礼仪规范。

“同志”进一步泛化为全社会可用的泛尊称的社会心理与前一阶段大体一致。从大众心理上来说，政府公务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居于较高的位置，专属于这一群体的礼貌性称呼本身就带有特殊意义。“同志”刚刚成为泛指性称呼的时候，大家使用时，多带着“新奇”与获得尊重的“骄傲”，尤其是以前不被尊重的底层职业，如上文提到的“民夫”，被军队政府的干部称为“同志”或“XX员同志”，既有超越原有阶层得到平等对待的自豪感，又有被视为自己人的“亲近感”；而自己可以用“同志”平等的称呼军队政府的公务人员在旧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大家很高兴被别人称“同志”，也很高兴用“同志”称呼别人，“互称同志”也因

22) 旧时科举入仕被视为“正途”，“同年”中举意味着是同一考官的“门生”，这样的官员之间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称“同年”常隐含有炫耀自己科举出身且与提到的相关人员关系密切。

此成为一种时尚。

但当人们对“同志”这一称呼习以为常时，这种心理上的特殊情感也逐渐消失。“同志”也随之成为普通的称谓语，从水平距离来看，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够亲近；从垂直距离来看，既不体现年龄长（如大哥、大姐），也不体现地位高（如科长、领导），更不体现财富、年龄、相貌任何一方面的优势，——使用者完全无法实现拉近社交距离或是“尊人”的交际目的。

所以，一般政府公务人员也只在涉及公务场合初次见面或不熟识的情况下互称“同志”。陌生人之间如果可以依据身份、年龄的差距套用其他称谓，那大多会放弃“同志”的称呼。近年来，人们对陌生公务人员由“同志”改称“领导”也可以侧面证明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同志”泛化的基础是其起到了拉近距离，“尊人”的社交目的，符合一般称谓语的使用规律；“同志”退出泛指性称谓语领域也是因为其无法继续实现交际目的，不再符合称谓语的一般使用规律。

4. 结语

通过对“同志”的历时演变情况的详细考察，发现其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可用于“互称”、“无等差”的泛指性社会称谓，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泛使用，是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呈现“一体化”特征与汉语词汇系统、称谓语使用及泛化的一般规律共同作用而成的。称谓语“同志”的兴起、泛化、衰落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它的每次变化都与整个汉语称谓系统的调整同步，或者说，“同志”的变化是汉语称谓系统整体变化的一部分。

在“同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使用范围的扩大、缩小主要是受社会整体结构变迁的影响，受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与实际语用需求密切相关，而强制使用的行政命令至多能保证其在某个领域中内的稳定存在。

从称谓语“同志”泛化的发展路径来看，其始终保有从属于【+某一共同政治群体】这一特征，所以严格来讲，并没有达到“全民性”的程度，其泛化过程与其他泛指性称谓语的泛化过程基本一致。

从“同志”的语用情况来看，其能够迅速发展、扩散，是因为起到了拉近距离，“尊人”的社交目的，符合一般称谓语的使用规律；其迅速衰退，退出泛指性称谓语领域也主要是因为其无法实现交际目的，不符合称谓语的使用规律。

參考文獻

- 梁章鉅（清），《稱謂錄》，湖南：岳麓書社，1991年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 曹煒，〈現代漢語中的稱謂語和稱呼語〉，《江蘇大學學報》第7卷第2期，2005年3月。
- 胡范鏄、胡玉華，〈“同志”稱呼語的語義功能與語用條件析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期，2000年。
- 俊虎，〈“同志”一詞的演化及其文化意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1年。
- 唐穎、曲晶，〈“同志”稱謂的源流及其演變原因〉，《社會科學戰線》第3期，2008年。
- 李樹新，〈現代漢語稱謂詞與中國傳統文化〉，《內蒙古社會科學》第3期，1999年。
- 劉炳香，〈“同志”稱謂的歷史沿革與使用範圍〉，《先鋒》第7期，2017年。
- 孫玉超、師文淑，〈“同志”稱謂的歷時演變及使用現狀研究〉，《現代語文旬刊》第6期，2012年。
- 于鵬，〈中國政府公務人員稱謂語系統面稱用語考察——以電視劇《縣委大院》為中心〉，《中國言語研究》第105期，2023年。
- 荀恩東、饒高琦、謝佳莉等，〈現代漢語詞匯歷時檢索系統的建設與應用〉，《中文信息學報》第29期，2015年。
- 荀恩東、饒高琦、肖曉悅、臧嬌嬌，〈大數據背景下BCC語料庫的研製〉，《語料庫語言學》第1期，2016年。
- 詹衛東、郭銳、常寶寶、諶貽榮、陳龍，〈北京大學CCL語料庫的研製〉，《語料庫語言學》第6卷第1期，2019年。

Abstract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Motivation of Generic Terms: A Perspective on the Appellative System of the Term “Comrade”

Jiao Yumei

The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appellative system lies in the concept of "hierarchical distinctions, emphasizing considerations of "respect for seniority (尊卑长幼)" and "degrees of closeness (内外亲疏)".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eneric term "comrade(同志)" seems to have fundamentally disrupted the established norms of the Chinese appellative system. Previous scholarship typically attributes the emergence and decline of "comrade(同志)" primarily to external factors.

Upon conducting a meticulous examination of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omrade(同志)",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generic social appellation, suitable for reciprocal use and devoid of hierarchical distinctions, is the outcome of a confluence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It represen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ternal circumstances and internal dynamics, reflecting the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tructures dur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epoch, alongside the general patterns within the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appellative usage, and the broader process of generalization over a protracted period.

The ascent, widespread adoption, and subsequent decline of the appellative term "comrade(同志)" do not occur in isolation. Each alteration in its usage aligns with the overall adjustments within the Chinese appellative system. In essence, the transformations in "comrade(同志)" are integral components of the broader shifts in the Chinese appellative system.

Key words : Comrade, Generic Appellative, Diachronic Evolution, Appellative System,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투 고 일: 2024. 1. 10. / 심 사 일: 2024. 1. 15. ~ 2024. 2. 15. / 게재확정일: 2024. 2. 20.